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 新中国峥嵘岁月 ——

王蒙：始终跃动“少年布尔什维克”初心

“人民艺术家”王蒙——一位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作家，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他以辉煌的创作实绩和多方面的工作，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少年到耄耋，从中学生党员到新中国的文化部长，那颗“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初心始终在王蒙的胸中跃动。1948年，年仅14岁的王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参加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对我的意义非常大，那是完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世界。我亲眼看见旧中国和旧社会是怎样分崩离析的，到处是危机，百姓没法生活下去。”

王蒙激动地说，新中国像朝阳一样，有诸多的可能性和期待；在革命战争胜利凯歌声中建立起来，社会焕然一新。

“新中国的成立、发展、建设是我一生的经历，也是创作的主题，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新中国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她的辉煌成绩我分享了，她的曲折和坎坷我也有经验。”

王蒙的文学创作与新中国的进步步履紧紧相连。

从上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改革开放后的《蝴蝶》《布礼》《活动变人形》等，到进入新世纪后的《这边风景》及“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王蒙始终敏锐地捕捉着时代的脉搏，关注现实、反映现实。他的作品清晰描绘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变迁，深刻剖析人们的内心世界。

在67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王蒙创作了1800多万字文学作品，出版近百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出版，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和多项国际性文学大奖，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高度。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与时代、现实相呼应：

1953年，王蒙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刻画了新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积极明朗、热情洋溢的精神风貌；

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显示出他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思考，以及在选材立意上的新意和勇气；

依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

生活劳动的丰富经历，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生动表现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火热图景，并于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表姐》《布礼》《蝴蝶》《杂色》等，显示出王蒙对历史与人生的回顾和思考，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图景中十分具有代表性。

谈及自己取得的文学成就，王蒙认为主要在于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

“我的兴趣广泛，热情持久，对各个阶段的各种情况都有浓厚的关注。我的少年、青年时代赶上革命成功和新中国成立，这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光明的底色，即使我日后遇到了一些曲折和挑战，也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王蒙说。

在任职《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期间，王蒙关注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其人生经历、精神状态、探索活力和情操品行，也影响和感染了后辈作家。

“曾经有一篇被编辑否定掉的稿子，我看了觉得不错，就让它‘起死回生’，给发表出来了。”王蒙回忆说，这

篇作品的发表影响了作者的一生，他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对于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手机浏览的现象，王蒙相信，人们将会重新燃起对书本阅读的热情，这要求文学作品拥有经典、深刻、永恒的价值，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在王蒙看来，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光辉成绩和痛苦探索无与伦比。“这样的时代应该留下文学代表的杰作、经典，应该有更多深刻的作品出现，有成就更大的作家出现，有对这段历史的更多的咀嚼、消化、记忆和加工出现。我相信会有这样更好的作品和作家。”

王蒙希望，青年作家们能以最高标准摆脱畅销市场的诱惑，为国家、民族和历史创造新时期的经典。

如今，85岁高龄的王蒙依旧笔耕不辍，今年以来，发表了《生死恋》《邮事》《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等多部小说。作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还承担比较文学、古典文学等研究工作。

“我希望能多写一点，一直写下去。”王蒙说。

文/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周玮（据新华社电）

崇山深处汽车城

人们曾这样形容十堰：十堰真奇怪，一条马路直通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诞生了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1969年10月，来自全国30多家工厂、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建设者以及竹山、竹溪、随县、大悟、枣阳、汉川、汉阳等县的2.5万多民工，汇集在十堰周围数十公里的工地上，拉开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序幕。

二汽的建设采取“包建”和“聚宝”的方针。所谓“包建”，是指二汽的20多个专业厂分别由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汽车厂及上海、武汉等地的30多家工厂负责，从设计、安装、生产准备、人员培训、设备调试直到投产都“包”下来。

所谓“聚宝”，是指国家组织了558家技术、设备先进的机械厂，为二汽制造了2万多台设备，组成了

500多条生产作业线和117条自动生产线。

“包建”和“聚宝”的方针，使二汽建成后就成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

1975年，二汽形成了第一个基本车型——2.5吨越野车的生产能力。1978年7月，形成了“东风”5吨载重汽车的生产能力。第三个基本车型——3.5吨越野车在试验的基础上于1980年经国家鉴定定型。

规模巨大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形成了华中地区一个新的机械工业中心，成为“三线建设”的一颗明珠，对于改善我国的经济布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外参观者来到鄂西北的十堰市，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感叹：共产党人居然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这片荒山野岭，建成了这样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汽车城！

（新华社电）

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升起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地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所占据。

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了长期斗争，并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1971年9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会前，美国同日本等国提出了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两项提案。一是“重要问题”提案（也被称作“逆重要问题”提案），即任何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建议都是重要问题；二是“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美日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从10月18日开始，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一周的激烈辩论。10月25日，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首先否决了所谓“逆重要问题”提案。此后，大会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联合提案进行表决，这个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

（新华社电）

呕心沥血为人民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为尽量减轻它所造成的损失，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极左思潮有所抑制，周恩来总理一直殚精竭虑、不懈努力。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提出要加快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他顶着江青等人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在农村工作中，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科学教育工作中，他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此外，他还抓了落

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虽然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实际上仍在以含蓄、迂回的方式继续着。

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此时他已74岁高龄，担负着连健康人都难于承受的极其繁重的工作。而且，他在各个领域的纠“左”努力，都受到江青等人的种种阻挠和刁难。他时常说：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重托，只有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新华社电）

万里长江第一坝

驯服长江洪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一个梦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毛泽东在听取治理长江的汇报时，高屋建瓴地指出，先修三峡工程，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

葛洲坝工程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1970年1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有关问题。随后，毛泽东作出批示赞成兴建此坝。12月30日，8万军民举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大典，中华民族朝着“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迈出了第一步。

在当时的形势下，葛洲坝工程建设采取的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由于种种原因，1972年底，决定工程停工。在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后，1974年底，主体工程重新开工。1988年

（新华社电）

王文教：新中国羽毛球事业“拓荒者”

“我回国后与当时的全国冠军交手，打了他个15:0、15:6。”被誉为新中国羽毛球事业“拓荒者”的王文教回忆道。差距如此悬殊，深深震撼了他，这促使当时年仅20岁的他下定决心离开印尼，回到祖国，为振兴祖国的羽毛球事业贡献力量。

当年的国际羽坛，中国队乃名副其实的主角。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的羽毛球水平也处于起步阶段。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1933年出生于印尼，上世纪50年代初是印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1953年，王文教随印尼体育观摩团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正是这次比赛，让他意识到了中国羽球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巨大差距。

运动会结束后，王文教又随团赴沈阳、上海等多地参观，看到祖国上下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离开印尼、回归祖国的想法也悄悄地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可这又谈何容易！回国，意味着不仅要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而且要与生活在印尼的亲人们分别。“我妈妈不同意，她说，你要回去受苦。我跟她讲现在有变化，新中国跟旧中国不一样，我母

亲不信，结果我还是要回来。”

1954年，王文教不顾印尼方面的阻拦和家人的反对，与搭档陈福寿等华侨青年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为此，他们毅然签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王文教的命运，也让中国羽毛球迎来了加速发展的春天。

回国之后，国家体委以王文教、陈福寿等为主，在中央体育学院成立羽毛球班，王文教担任教练和队长。训练设施的不足和物质匮乏，起初让王文教有些不适应。当时北京没有合适的场地，他就带着队员们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由于营养不够，王文教的腿部出现了浮肿。

“回来的时候需要粮票，没有粮票买不到东西。后来我妈妈知道我出现了浮肿，就寄了好多吃的给我。”王文教说，“当时我一回来，有6个月试用期，试用期间只有17块人民币，伙食费还要交9块，只剩下8块钱，后来我的自行车也都卖掉了。但这不算什么，因为我感觉年轻人怎么样都行，因为体育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

1956年11月，福建省成立了我

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随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等相继建队。两年后，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羽毛球队。这些集训队伍均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有关羽毛球训练方法（后结集成书，名为《羽毛球》）为指导刻苦训练。在此期间，全国性比赛也开始密集举行。王文教等人带回的先进打法和理念，犹如一颗“火种”呈燎原之势，使羽毛球运动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运动员技战术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伤病缠身的王文教逐渐淡出比赛，专心当教练。王文教曾因为“海外背景”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改造”。直到1972年初，王文教从农村被调回北京，负责组建新的国家队。王文教重新回到钟爱的羽球世界，将国家队总教练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扛在肩上。

执教二十余载，王文教培养出一大批羽球人才：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其执教期内，中国羽毛球队一共获得56个单打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在这众多冠军中，让王文教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82年率队参加在

英国举行的汤姆斯杯，那也是1981年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后首次参加该项赛事。

“当时的决赛，我们第一天1:3落后印尼，第二天打他们4:1，总比分5:4反败为胜。当时很自豪，感觉到我们能够为祖国争光，很不容易，而且当时是英国女王给我们发奖，就觉得中国人非常了不起。”

两年后，中国女队又首次在尤伯杯中折桂，并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征程。

毫不夸张地说，王文教，就是中国羽毛球走向辉煌的奠基人，而“人民楷模”的称号正是对其几十年来心怀祖国、辛勤付出的最好褒奖。

在得知获得这一称号后，王文教说：“感谢祖国还惦记着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年纪都大了，已经退休了。获得国家的认可我非常激动，前几天回到福建老家，乡亲们都说家出了只‘金凤凰’。”

如今的王文教，虽然离开国家队一线多年，但他的爱国情怀、为国争光的精神，仍激励着中国羽毛球队年轻一代，向着中国体育新的辉煌前进。

文/新华社记者 韦骅 林德初（新华社电）

要有信心和恒心，巩固好扶贫成果，把扶贫产业做精做细，为乡村振兴铺好路。”余留芬说。

10月1日，一汽集团组织员工集中观看了庆祝大会盛况。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红旗检阅车在长安街检阅部队，员工们非常振奋。

“我是从一名基层技术工人成长起来的，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历程。”一汽红旗工厂首席技师齐高宇表示，将勇攀技术高峰，加快推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早日实现汽车强国梦。

作为援疆干部，新疆伊宁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仲兆圣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伴随‘一带一路’的春风，伊宁已经成为我国向西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开放发展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更不能有任何地方掉队。”他说。

国庆期间，90后创业女青年江小梦正在忙着扩建制茶厂房。4年前，高校毕业的她带着改变家乡的梦想，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回到湖南郴州创业，如今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生态茶叶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作为青年人，要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建设，为祖国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江小梦说。

“创造美好生活、建设美丽中国，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时代追求。”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周海江表示，作为企业当家人，一定要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把企业梦想融入中国梦，为祖国的美好未来增光添彩。

文/新华社记者（据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中国梦想成就于亿万人民共同奋斗

（上接第一版）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国家卫健委驻山西永和县骆驼村第一书记徐宏心潮澎湃：“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是党带领亿万人民用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力拼搏铸就的。作为一名青年扶贫干部，我将不辱使命、不负青春，带领全村百姓用勤劳和智慧脱贫致富奔向小康。”

不忘初心 民心所向 奋斗不息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从“凝心铸魂”方陣彩车上走下来，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员马善祥除了激动，更有一份沉甸甸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方向和力量，我将继续做好服务调解工作，通过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生活更和谐、更美好。”马善祥说。

可可西里，一片苍茫。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护站站站长秋培扎西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庆祝大会，泪水流出了眼眶。那一刻，他想起了为保护可可西里牺牲的父亲和舅舅。

“我们要为祖国和人民守护好青山绿水，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秋培

扎西坚定地说。

“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还要美起来。连江是海洋渔业大县，我们将努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减少对海洋环境的破坏，让更多渔民从中获益，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福建连江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徐建峰说。

秋风送爽，地处吕梁山深处的山西省岢岚县宋家沟村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村广场上，“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标语格外醒目。

村党支部书记雷文斌看到“脱贫攻坚”方陣彩车上闪动着减贫数字，下定决心：“脱贫摘帽只是第一步，在巩固好脱贫成果的同时，要主动谋划乡村振兴，把穷山沟变成现代化新农村，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国庆假期，敦煌莫高窟游客如织。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需求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感受这座千年宝库的魅力。“我们通过研学等不同方式提供分众、精准的参观体验，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说。

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生态优美、文化繁荣……一幅新时代中国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

参加群众游行的高丰和董婉秋是一对来自美团外卖的骑手夫妻，高

时不我待 共创新中国 美好未来

“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豪迈话语，吹响了奋斗的号角。基层党员干部群众表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上，要把满腔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力拼搏的实际行动，开创新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2日下午，从北京参加完庆祝大会，“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宁夏灵武白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王有德一下飞机，来不及回家，便直奔心心念念的马鞍山生态治理区。“生命不息，治沙不止。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奋战沙海，为家园再添新绿。”王有德说。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余留芬在北京参加完庆祝大会后顾不上逗留，就赶回了家乡。“脱贫攻坚是持久战，我们基层干部